

编者按

海洋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更为紧密,一方面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能源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也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小的压力。新世纪以来,海洋史研究日益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青睐,不过海洋环境史却遭到忽视。怎样理解海洋环境史的内涵?如何认识历史上人与海洋环境的互动关系?如何提高社会公众的海洋意识,进而形成海洋环境保护的自觉?围绕上述问题,本版分别从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的角度刊发文章,以期对海洋环境史研究有进一步的认识。

演化中的蓝色行星

——撰写新的海洋环境史

□ 侯 深

1972年,阿波罗17号从距离地球29000公里的寥廓太空中拍下了一幅名为“蓝色弹珠”的照片。这帧迄今为止世界上翻印次数最多的照片聚焦从地中海到南极的区域,上方是褐色的非洲大陆,亚洲在天际线遥遥隐现;下方云气翻涌,皑皑茫茫,而照片中最醒目、最广阔的图像则是一片深邃而层叠的蓝色,缠绕着白色的水纹。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大陆,进入亘古想象的太空中时,看到的是一个蓝色的星球,一个被海洋覆盖的星球。

“蓝色弹珠”问世之时,正是西方环保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这是一个被称为“生态学时代”的年代。是以,来自天外的“蓝色弹珠”被赋予形形色色的生态解读。在遥远的太空中,这个蓝色行星显得美丽非凡,却又孤独而脆弱。“只有一个地球”并不只是科学家的话语,政客的说辞,或者环保行动主义的口号,而是坚硬的生态现实,它迫使所有人重新思考世界的当下与未来。当历史学者将自身融入“生态学时代”时,他们也开始以生态学的认知为文明寻找位置,反思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如何将这个星球带入今天的世界。

但是,在环境史发展的最初三十年间,“蓝色弹珠”所展示的大部分世界——海洋,鲜少出现在这个新领域的学者眼中。大部分环境史学者首先关切的是绝大部分人类生活的地方,即土地和土地上的有机与无机存在。当然,历史学者并非全然没有尝试凝视海洋。费尔南·布罗代尔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俘营便开始想象一个浩瀚的天地,他的思想超越了王侯将相的兴亡成败,国家民族的边界区隔,也超越了王朝与文明建立的土地,而去探索地中海世界。他告诉人

们在撰写这部历史的时候,另一类重要的记录“是由邻近学科的学者——民族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工艺学家——撰写的”。有赖于此,布罗代尔敦促历史学者“思考一下地中海是否还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强大的生命,思考一下地中海的生命除了展现引人入胜的画面以外,还起着什么值得人们重视的作用”。如此思考令布罗代尔在时间的流中发现了漫长的“地理时间”,个中承载着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历史。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省思对历史学者,特别是环境史学者而言,无疑深具启发意义。但是,布罗代尔所借助的来自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有限的,他所承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以降的地理学传统对地形和气候的考量,而对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生态学知之甚少,更不可能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方兴未艾的海洋学。所以,在其地理时间中发生的历史近乎静止,即使有所变化,也极为缓慢,循环往复。因为在他的理解中,包括海洋在内的地理环境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其构成是坚固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蓬勃发展的海洋学在90年代之后逐渐渗入历史学者的研究之中,为新的海洋史的写作范式提供了可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罗代尔所开启的范式已经陈旧过时,遭到淘汰;恰与之相反,历史学者携带着他刻下的有机与无机存在。当然,历史学者并非全然没有尝试凝视海洋。费尔南·布罗代尔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俘营便开始想象一个浩瀚的天地,他的思想超越了王侯将相的兴亡成败,国家民族的边界区隔,也超越了王朝与文明建立的土地,而去探索地中海世界。他告诉人

构成海洋的除了水与岩石,还有一个超乎人类既有想象的巨大生命世界,它们伴随地球生命的初始时刻出现,在亿万年的时间中,演绎着蓝色行星完整的演化历史,而人类的历史深刻地根植于其中,与其他生命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些新知都挑战着原有的海洋史叙述,它令历史学者意识到,海洋不仅是连接不同文明的媒介,运输输板、货轮的载体,蕴含文明所需各种资源的供给体,还是一个同陆地生态与文明协同演化的庞大生态系统。历史学者需要询问,面对这些挑战,新的海洋史已然做了什么,未来还能够做些什么?

海洋新知中传递的第一重信息是关于海洋世界的无休止变化。正是基于对变化的认识,海洋史与环境史相遇,开始赋予海洋,也赋予同海洋碰撞、交融的文明以生态的解释。在新的海洋环境史的认识中,不可能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方兴未艾的海洋学。所以,在其地理时间中发生的历史近乎静止,即使有所变化,也极为缓慢,循环往复。因为在他的理解中,包括海洋在内的地理环境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其构成是坚固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蓬勃发展的海洋学在90年代之后逐渐渗入历史学者的研究之中,为新的海洋史的写作范式提供了可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罗代尔所开启的范式已经陈旧过时,遭到淘汰;恰与之相反,历史学者携带着他刻下的有机与无机存在。当然,历史学者并非全然没有尝试凝视海洋。费尔南·布罗代尔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俘营便开始想象一个浩瀚的天地,他的思想超越了王侯将相的兴亡成败,国家民族的边界区隔,也超越了王朝与文明建立的土地,而去探索地中海世界。他告诉人

塑海洋。这些由人类活动而引发的变化促使科学家意识到,海洋存在自身的承载限度,其复杂的生态系统同样无比脆弱,此为海洋新知带来的第二重信息。对其有限性与脆弱性进行反思,最早出现在海洋环境史研究最为发达的领域——海洋渔业环境史当中。在爱尔兰圣三一学院以环境史学者保罗·霍姆为代表的渔业环境史团看来,从16世纪开始,整个世界由于新大陆海洋的开辟而启动了一场“渔业革命”。早期的渔业类似陆地上的采集、狩猎,海洋可提供资源的丰歉决定了人们收获的多寡,虽然会引发鱼类数量的变化,但是鲜少带来物种的改变。伴随技术的改进和人类文化变革造成的口味变化,海洋渔业开始在可控区域进行养殖,流动的渔民变成定居的养殖户,汲取土地财富的方式开始在海洋上实践,海洋的物种由此发生变化。

在生物性变化之外,人类活动同样带来海洋的物理与化学变化。伴随人口与经济增长,所有的沿海区域都转向海洋,寻找将沧海转变为桑田的方式,它带来的不仅是海岸线在地图上的形状变化,更带来近海生态系统的整体变迁。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显著的影响则是化学变化。早在蕾切尔·卡森的时代,对核废料的恐惧已经在海洋上空弥漫,2013年的福岛核电站爆炸令半个世纪以来被技术与意识形态包裹的核安全美梦轰然破灭。如果说核污染是人类可为海洋,乃至整个蓝色行星带来的化学影响的极致反映,那么塑料则是一种日常。它们或以塑料制品形式在海洋中构成一个个巨大的塑料堆;或以微粒的形式藏身于每一粒水分子中,无论是北极的坚冰,还是黝黯的深

海。它们束缚海洋生物的身体,对海洋生命与其栖息地进行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也以食物链的形式最终回到包括人类在内的陆地与天空生命的机体当中。

在海洋学带来的所有新知中最重要的一重是关于生命演化历史本身的新知,它启发人类重新审视我们这个物种真正意义上的深层历史,不是几个世纪中社会的起伏动荡,不是几个千年文明的消长兴衰,而是人类与海洋之间本源性的生命联系。海洋是所有生命的最初家园,在演化的过程中,一部分生命来到陆地,然后栖息、繁衍,最终丧失了重新回到海洋生活的生物能力。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人类始终在寻找同海洋发生联系的方式,这个寻找的过程是一个自然与文化的协同演化过程。它既包括人类物种的生物演化过程,又包含文化基因在自然世界中不断调适而发生变化的过程。曾几何时,仰仗海洋生存的人群同陆际交界处所有的物种一样,在潮起潮生的自然律动中找寻自身生存与生产的节奏。城市、工业时代的到来锻造了新的生产、消费与生活方式,人们在这三重新方式中为海洋确立了新的位置。它远不再是仅仅有着渔盐之利的有限资源供给体,还是全球贸易得以运转的基本载体,是拥有无限财富与可能的新边疆;更进一步,对新的城市生态秩序而言,它成为大众消费主义青睐的所在。人们以食物的新陈代谢重建与海洋的生物联系,也在新的审美需求中寻找同海洋之间的智性与精神联系。这两重联系的建立、断裂与维系的叩问,可以成为新的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密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莱姆小镇、玛丽·安宁和侏罗纪海岸古生物化石的发现

□ 梅雪芹

倘若读过英国当代作家约翰·福尔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有可能记得小说开篇描写的英格蘭向西南延伸的狭长部分那个当地最大的港湾莱姆湾,以及被视为其名称之源起的古老小镇莱姆里季斯;也有可能回味小说的男主、那位虚构的古生物学家查尔斯,在昏暗、弯曲的科布堤上与黑衣女人邂逅的场景。如果还看过由此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更有可能将黑衣女人在那防波堤上对查尔斯回眸远远一瞥的经典瞬间定格在脑海中。此景此情,似曾连着本文所及的地方、人物和史实。

这地方,即莱姆里季斯或莱姆小镇及其坐落的莱姆湾;这人物,即莱姆小镇一个名叫玛丽·安宁(1799-1846)的女子;这史实,即玛丽·安宁关于侏罗纪海岸古生物化石的几次重大发现。因为这些发现,原本贫困潦倒、地位低下的女子玛丽·安宁不仅受到尊敬,被称为Miss Anning,在科学界尤其是古生物学和古脊椎动物学圈内人尽皆知,而且还享有“史上最伟大的化石采集家”之称。现在,她的家乡莱姆镇每年都会举办“玛丽·安宁日”。

其实,自19世纪前期以来,关于玛丽·安宁发现古生物化石之事即存在不少谜思,其母亲甚至说过自己的女儿“是一段历史,也是一个谜团”。人们困惑的是,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贫寒女子玛丽·安宁为什么会成为名垂青史的发现?对于这一问题,显然需要超越社会史尤其是女权主义的窠臼,深入到更具也更宏阔的历史时空中去思考和探究。让我们从英语中著名的绕口令《卖贝壳》说起,其中几句说的是:

她在海滨卖海贝壳(Sea sells sea-shells on the sea-shore)

我肯定她卖的贝壳是海贝壳(The shells she sells are sea-shells, I'm sure)

因为如果她在海滨卖海贝壳(For if she sells sea-shells on the sea-shore)

那我就肯定她卖的是海滨贝壳(Then I'm sure she sells sea-shore shells.)

这个绕口令由英国歌词作家特里·沙利文创作于1908年,其创作受到了安宁的启发。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玛丽·安宁不同于历史上一般的古生物学家,她并非为了研究而是为了生计才去搜集贝壳和化石。即便如此,其搜集活动还是得到了高度评价。那么,如何理解她的活动和史迹?笔者认为,她之所以能够搜集化石并且有重大发现,还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地利、天时、人和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位于莱姆湾的莱姆镇,在自然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是英国侏罗纪海岸——一个以化石闻名的世界自然遗产的中心地带,玛丽·安宁便出生于此地。这个小镇的天然优势地位,外加风暴及海浪的冲刷和侵蚀,使化石裸露出来,玛丽·安宁才得以有惊人的发现。

其实,英国侏罗纪海岸远不只莱姆湾那一段,它西至德文郡东部的埃克斯茅斯奥科姆岩石群,东到多塞特郡斯沃尼奇老哈里巨石,全长153千米。那么,为何是莱姆的发现,原本贫困潦倒、地位低下的女子玛丽·安宁不仅受到尊敬,被称为Miss Anning,在科学界尤其是古生物学和古脊椎动物学圈内人尽皆知,而且还享有“史上最伟大的化石采集家”之称。现在,她的家乡莱姆镇每年都会举办“玛丽·安宁日”。

方和那个时代,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

据史料记载,莱姆于1285年建港,从13世纪末开始即成为英格兰的一个主要港口和造船中心,与法国保持着频繁贸易联系。在16世纪晚期,此地是皇家海军迎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场所。到19世纪初期,则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令》和英法战争的影响而出现转折性发展,主要是本地海滨旅游业的兴起,从而使它较早地成为海滨胜地,供游人沐浴海水,饱览海景;特别是其海滨的海洋生物,使得人们兴趣盎然。于是,各色人等来来去去,有的还在这里结婚生子,扎下根来,玛丽的父亲理查德·安宁即是其中的一员。老安宁1793年9月从德文郡的克里顿迁来此地,以做木匠为营生,偶尔也搜集化石,并将它作为稀罕之物卖给海边游客,因此闻名遐迩,引得名自布里斯托尔、巴斯、牛津和伦敦等地喜爱收藏化石的各路人员纷纷叩门问津。

老安宁也将搜集、展示和销售化石的本领传给了儿女。在其1810年11月不幸身亡、孤儿寡母撑起家庭的需要,一次次在悬崖峭壁上从事高度危险的化石采集活动,以至具有更多的发现,如1823年发现蛇颈龙亚目化石、1828年发现翼龙化石,从而在那个被称为“地质学英雄时代”的19世纪前期,赢得了不少专业或业余的化石搜集者的青睐。他们不断走进玛丽家的大门,讨论她的发现,购买她的化石。

玛丽·安宁可谓生逢其时,尽管她曾遭遇过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被诋毁,但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有人买她的化石,使其在经济上得以解困;有人帮她记载和描绘她的发现,包括当地的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使她的活动得以及时载入史册;也有人帮忙宣传她的生平事迹和发现活动,使得英国本土、美国以及其它更多地方的人与她早就了解了她的贡献。而在离世之后,玛丽·安宁还“拥有了一小群铁杆粉丝,他们花了无数时间研究她的一生”,足见其发现海洋生物化石一事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其发现的影响和意义,19世纪中后期的科学界已有认知,主要是从打击了基督教《圣经》宣传的神创论以及时人信仰的物种不灭论等方面而论的,可谓石破天惊。我们今天讨论这段历史,试图强调的则是,19世纪前期莱姆湾边莱姆小镇上的玛丽·安宁等人在侏罗纪海岸发现古生物化石,不仅成为自然和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反映了长、中、短等多重时空有机交错的复杂情形——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玛丽·安宁发现活动的初衷所在。

其中的长时空甚至超长时空,指的是漫长的地质时期及与此相联系的宏阔区域,它们远远超出了化石被发现的海岸和海湾,这是由化石本身反映出来的,它们由此成为认识地质史的一类材料;中时

空,主要指的是海滨小镇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关联的周边地区,也包括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历史,它们因海洋、海峡、海岸、海事包括军事活动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其家人而言,他们主要是为解决生计换取食物而不惜冒险采集化石,这背后反映了海岸居民靠海吃海的真实状态。同时代其他有关人士则包括莱姆本地的地质学家、历史学家、宗教人士和居民,以及远近而来作为游客的地质学家、博物学家、商人等,他们因各自的需要而与莱姆湾、莱姆镇和侏罗纪海岸或深或浅地打着交道。这三重时空因海洋生物化石的发现有机地交织起来,不仅成为时人的谈资,更成为今人了解与研究某类过往的载体。

总的来看,玛丽·安宁的故事集中代表了人与大海互动关联的一段历史,是海洋环境史的一个方面、一个主题。这段历史之中许多相关史实已被挖掘出来,其中不乏扑朔迷离的细节和渲染之处,也存在一些待解之谜。但无论如何,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探寻海洋作为生命起源之所的真相,理解海洋对人类及其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性,进而思考自然与人类共同创造历史的意愿。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世人眼里,澳大利亚是个海洋大国,其壮美的海洋景观举世闻名。然而国际环境史联合会前主席、澳大利亚环境史学家莉碧·罗宾在代表作《一块大陆如何创造一个国家》中,讨论20世纪初澳大利亚的环境与生态学知识如何影响其建国时代的文化认同时,并没有提及海洋。这并非作者的疏漏,而是因为此时澳大利亚民众的海洋意识还较为淡薄。这种海洋意识是在20世纪伴随科学家、媒体及政府合力推动治理大堡礁过程中兴起的,最终也围绕相关的科研与教育实践形成了海洋环境保护的自觉。

□ 费 晟

澳大利亚虽然被南太平洋环绕,但除了人口极少、偏居一隅的托雷斯海峡岛屿居民,大部分原住民的生计基本局限于陆地环境。1788年后,欧洲殖民者逐海而来,沿海定居,主要是为了享受温带海洋性气候,并不向海而生。一方面,英国有意压制流放犯殖民地的远洋能力与海洋经济;另一方面,殖民者不断向陌生内陆探索并开发农牧矿资源,最终形成了基于荒野环境的移民社会核心文化认同。

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狂潮中,德国与美国分别向南北太平洋群岛快速扩张,深深刺激了被这些岛屿环绕的澳大利亚。1908年,澳大利亚联邦运动领袖、第二任总理阿尔弗雷德·迪金因不满英国对澳大利亚海洋地位的长期轻视而邀请正在全球巡访的美国“大白舰队”来访。借助舰队访问唤起的全民海权意识,澳大利亚于1913年正式建立自己的海军。在此过程中,民众的海洋意识逐渐被培育。其中,大堡礁作为标志性海洋景观,成为澳大利亚举国上下欣赏与保护海洋环境的思想源泉。

□ 费 晟

大堡礁位于昆士兰热带海域,是地球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但在澳大利亚,它长期以来非但不受青睐,而且被避之不及,因为它会妨碍航行。库克船长就深受其苦,达尔文干脆称它是“障碍”。

转机发生在1889年,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所推荐的英国同行威廉·萨维利-肯特被任命为昆士兰的渔业专员。他推动利用大堡礁养殖珍珠获得成功。而在这一过程中,萨维利也系统考察了大堡礁生态体系,尤其是填补了海洋生物学对海马等生物繁育问题的知识空白。他于1893年开始出版自己对大堡礁的记录,分享这里的奇妙环境,最终在联邦建立后引发了整个英语世界的关注。百业待兴的澳大利亚人方才意识到,高更等欧洲浪漫主义艺术家笔下动人的南太平洋风景其实就在自己身边。不久之后,受惠于昆士兰地方政府的记者艾德蒙·班得菲尔德开始专门写作大堡礁海洋观光指南并探讨海洋文化的价值。从1924年开始,博物学家兼电影制作者诺尔·芒克曼与妻子也开始连续出品关于大堡礁的宣传片,同时探讨海洋环境对澳大利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海洋开发与观生计换取食物而不惜冒险采集化石,这背后反映了海岸居民靠海吃海的真实状态。同时代其他有关人士则包括莱姆本地的地质学家、历史学家、宗教人士和居民,以及远近而来作为游客的地质学家、博物学家、商人等,他们因各自的需要而与莱姆湾、莱姆镇和侏罗纪海岸或深或浅地打着交道。这三重时空因海洋生物化石的发现有机地交织起来,不仅成为时人的谈资,更成为今人了解与研究某类过往的载体。

得益于对大堡礁的宣传、想象与开发,澳大利亚大众文化中越来越多地包含海洋元素,从黄金海岸到大洋路,多元化的海洋景观成为澳大利亚的财富。但是自大堡礁等进入大众视野起,旅游、捕鱼与运输等问题也对海洋环境提出了持续挑战。

事实上,萨维利早已提醒要“可持续开发”。因为他认为,相比而言,人类的海洋环境知识积累有限,开发活动的生态后果难测,所以一定要适度。而大力推销大堡礁的芒克曼则生都在呼吁潜水游客不要采摘珊瑚。但是直到1969年,澳大利亚保护基金会才召开全国性的研讨会以应对海洋环境问题。因为昆士兰地方政府开源手段有限,一直不愿意限制海洋商业开发,甚至在1967年批准2000多万英镑的大堡礁石油开发项目,结果引发了全国性抗议。尽管项目最终被叫停,但是开发抑或保护海洋环境的问题凸显。在环保人士的呼吁下,1975年通过《大堡礁海洋公园法》,以设立国家公园的方式确立了联邦政府对所有相关环境拥有“保护、保存与管理”权。1983年,联邦政府又以《签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签约国必须遵守国际法为理由,通过了

澳大利亚的海洋意识与海洋环境保护

□ 费 晟

《澳大利亚世界遗产保护法》,确定了海洋环境管理以保护为优先原则。从此,澳大利亚联邦不断扩大海洋保护区,对旅游、捕鱼、采矿及航运都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管控。

□ 费 晟

澳大利亚对大堡礁的保护采取划分为不同区块、各自有相应保护政策的办法。这其中,重视海洋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生物管控问题,可以追溯到1962年大堡礁遭遇的棘冠海星之灾。经过多年的研究,人们才意识到海星过度繁衍致灾其实是周期性的自然现象,绝非人力可简单阻止,但珊瑚礁白化、台风和水质浑浊会加剧灾情,因此在不同阶段的特定地区可以选择性防控上述问题。其次是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的影响,这源自过去40年对珊瑚礁白化的研究,除了水体污染和光照因素,学界认为水温持续变暖是珊瑚虫大规模死亡的主要诱因。因此,海洋环境保护与全面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休戚相关。显然,自然科学研究大大提升了海洋环保的效率。

在此基础上,海洋环保教育与实践也全面展开。在中小学,海洋保护与水资源保护教育紧密结合,讲授主题包括理解人与海洋环境之间的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与海洋环保的关系及澳大利亚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等,此外还在实践教学中心培养学生收集梳理海洋信息的技能。在大学,跨学科的海洋研究日益活跃。西澳大利亚以渔业经济史研究为抓手,开拓了海洋环境史、海洋灾害史研究等领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方面调动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合作深挖南太平洋岛屿航海民族的本土知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人文学者与极地海洋科学家合作,以塔斯马尼亚为基地,派遣学者前往南极海域进行联合科考并整理数据,力争展示历史上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的碳、氮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复杂互动的问题,最终影响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另外,澳大利亚在沿海城镇广泛设立海洋博物馆,激发公众保护本国海洋环境的意识,并参与对公海环境的保护。

澳大利亚的历史经验显示,海洋固然是一种人们可以触碰的物理性环境,但它不必然滋养出环境保护文化。现代海洋环保文化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对其多角度的欣赏与认可,而国家力量的推手作用至为重要。此外,系统的、跨学科的海洋研究,不仅有利于协调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治理关系,明确海洋环保的具体范围与措施,还能够将海洋环保从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转化为环保知识生产与传承。

(作者系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教授)

世界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654